

# 中国的地理环境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鲁迅的中国文化观研究之一

张 琢

## 一、空间和时间·“历史和数目”

### (一) 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舞台，就象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人类首先是自然的产物。人由动物进化为人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进程，也仍然离不开相应的自然环境的舞台，而且广义地讲，人类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仍然是人类生存和演变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不过，人类的生产力愈低下，离动物状态愈近，对自然环境的直接依存性便愈大。人类的生产力愈发达，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力愈强，一方面使人类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束缚和局限愈小，而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愈深广——所以，这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的减弱，倒不如说是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的深广发展。

愈往上溯，人类主宰自然的能力愈弱，对天然环境的直接依赖便愈强，稳定的天赐丰厚而四季变化很小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成了人类由以演变而来的猿类的故乡。

但是，稳定的环境虽然有利于稳定的生活，却不利于变异和进化。而在那个洪荒世界，作为自然生物的一部分的人类祖先猿类的进化，几乎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其演变的速度只能由自然界进化的尺度来衡量。

大约在新生代第三纪由印度板块冲击亚洲大陆引起东西强烈隆起的喜马拉雅新构造运动形成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天然屏障，使喜马拉雅山山南的南亚和隔印度洋相望的亚、非两道南北走向的山脉——现今中缅边界地区的横断山脉和东非的肯尼亚山脉一带成了人类最早的发源地。这些地区位于热带、亚热带，气温自山麓向上逐渐降低。在不同层次的气候条件和环境中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生态。这种环境正是生物适应环境而变异，使自己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的难得的天然条件。人类第一代人科成员腊玛古猿正是在这种多样的生态环境集中的地区找到了自己栖息和依不同环境条件而变异进化的理想乡。

就迄今为止古人类学家一般所承认的人类发展已经历的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这五个发展阶段看，唯有中国境内的化石和其他遗存在时间上互相衔接、连贯，无论从体质类型的连续性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看，都可以构成进化系列完整的

发展系统，而没有“缺环”。<sup>①</sup>而且，据近年对中国人的血清血型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发现，中国大体以北纬30度为界，南方人和北方人在遗传基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的形成，需要约二百万年时间。这证明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两大进化群体。这是由中国幅员的辽阔和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的地理条件决定的<sup>②</sup>。

在大约距今万年前左右，一些最古老的民族在北非（尼罗河流域）、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南亚（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和东亚（黄河和长江流域）先后建立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

根据近几年我国各地考古的最新发现证明，中国的文化至少有八千年历史：甘肃新发现的八千年前的世所罕见的彩陶，湖南发现的约七千年前的绳纹陶器，还有河北、河南、长江下游、辽宁等地的考古发现，都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由氏族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又逐渐演化为奴隶制时代的“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这种宗法关系延续到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形成了中国极端尚血统、崇家族、重传统的传统。

中国的古代文化悠久而又丰富，尤其如汉、唐那样吸收中亚、西亚、南亚文化，而使得中国封建盛世的文化大放异彩，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汉民族的政权为入侵的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之后，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地域富饶辽阔和经济文化的先进性，结果也仍然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同异族文化融合而告终，而不是被取代、被毁灭。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象印度本土的古文化被由西北入侵的雅利安人摧毁；没有如同古埃及文化在亚历山大帝国占领后被希腊化并十次废兴；也没有象地处亚、非、欧走廊地带的两河流域文化的大起大落、几经沧桑；更没有象罗马文化那样被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日尔曼人埋葬，形成文化的“断裂”和“断层”；而是在起伏波折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连续性。

甚至即使在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使上述亚非各文明古国无一例外地沦为殖民地，丧失了民族的独立和本民族的政权的时候，中国还依然苦苦地支撑着自己的民族的独立和民族政权，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没有中绝自己的文化。

**象中国这样在一国范围内的从猿到人，从蒙昧到野蛮，从野蛮到文明，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延续至今，无“缺环”、不间断的悠久的进化史，为世所仅见。**

中国现今领土面积的精确测量数为1,045万平方公里，<sup>③</sup>仅次于苏联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由于土地辽阔，地形复杂，各地距海洋远近相差很大，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气候和生态环境。而且中国全境都处于北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比大部分国土地处高纬度地带的苏联、加拿大更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天然的发展农业自然经济的有利条件，对于古代农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尤其重大。长江、黄河、淮河、珠

① 参见陈恩志《论中国境内从猿到人独自进化和发展系统》，载《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一期。

② 苏联和加拿大都比中国地域辽阔，但却都不具备象地处热带、亚热带的横断山地区那样的气候和那样集中的多层次的复杂的生态环境。迄今为止，在苏联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六、七十万年前生活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人类的遗存。

③ 我国领土面积最新数字：我国领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这一说法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最近从有关方面获悉：经最新科学度量结果，我国领土总面积为1,04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940万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000平方公里，领海228,000平方公里。（《信息日报》1986年4月20日）

江、辽河等众多的河流，宽广的冲积平原，更成为经营农业的理想乡。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在这些大河流域开创了农业文明，并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最众多的农业人口**。

我们知道，**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历史文化因素的积淀的厚度是与时间的长度和作为该文化的活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时间愈长、人口愈多，历史文化的积累愈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厚度愈大，力度愈强**。正是凭借为世所仅见的从猿到人延续至今的无“缺环”、不间断的进化史和世界最众多的人口，形成了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数目的力量**”（《坟·我之节烈观》）。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在数量上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优势和劣势，支撑力和保守力之所在。

##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

中国的这个地理环境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数目”的量，同时也规定了它的质。

中国东临大海，北接在古代人烟极为稀少的西伯利亚，西北、正西和西南部为浩瀚的沙漠、世界最高大的高原和山系把中国的腹地和西亚、南亚及更远的西方世界隔开。而在中国自己的领域内，又拥有比世界其他各文明古国更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迁流的广阔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质的特点。

作为大陆文化，它既不同于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在大海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海岛上的民族（如近代以前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岛民）的孤岛文化的特点，也不同于欧洲地中海和北海沿岸的巴尔干、亚平宁、伊比利亚、斯堪的拉维亚等半岛和英国、地中海诸岛及尼德兰等濒海地区，以海洋为依托而生存、发展的海洋文化的特点。

而同是“大陆文化”，主要基于农耕生活的中国的主体文化又突现出农民家庭农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使它具有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草原文化）不同的静态的特点和沉稳性。这有利于文化的积累，却不宜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文化的变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农业文化，但并不是单一的农业文化。由于土地辽阔，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民族和人口众多，因此它得以从不同民族和同一民族不同地区发生发展起来的多元的不同文化基因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复合文化结构。加上不同时期对远近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不同程度的吸取，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世界进入工业社会时代以前的古文化比较而言）。

这样以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为依托，以具有相对“隔绝机制”的地处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东亚为舞台，便形成了**历史的连续最长、作为文化的“活载体”的人口最众多的以农民家庭农业为基础和主体的中国传统大陆农业文化**。

正是这种历史的长久的连续性、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口众多、农耕生活的稳定性、对远近各种文化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化的注重，使中国的历史典籍丰富无与伦比，使中国素有“文明古国”和“史国”之称。

中国的传统文化象任何事物一样，具有自己的二重性，起过二重作用（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并且体现得很突出。这种二重性和二重作用不仅体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事件上，同时也体现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这种二重性和二重作用既然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变化着的，所以其性质和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也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正好走到它的反面。

尤其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时，其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更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基本特征？它在历史上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怎样才能适应今天的时代需要？

这是现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也是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回答的问题。

中国这次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而带来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活跃而勃兴的“文化热”仅仅几年（如果从1982年12月由《中国文化》编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集全国三十多个单位十多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在上海召开的解放后第一次以中国文化史研究为主题的专门学术讨论会——“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sup>①</sup>算起，不过四年），但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解放前的一个多世纪中至少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改革的先驱者龚自珍、魏源，中经由洋务运动脱胎出来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到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维新时期启蒙大师，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讨论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初以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为转折点，中经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借着革命实践的浪潮短暂闪光，接着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复辟逆流的反扑，然后导向了火山爆发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既是中西文化在“生动的混乱”中大交汇的时期，也是思想解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论争最活跃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为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分化，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派别各自沿着自己的思想路线走向了深入。其中，有些绕了一个圈子还是做了“线装书的俘虏”，回到了国故的故纸堆；有的搬弄着“西装革履”的洋书，可是啃不动，食不化，仍在那里打嗝；然而更重要的是造就了象鲁迅那样真正吃透古今，贯通中外，总结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科学的解剖，并且继承和摘取中西文化的有价值的成分，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伟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其所以成为巨人，无不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上，同时又有卓越的创新。如果我们老是从自己一时的感想开始，做重复劳动，对推进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是难有裨益的。所以选择好我们研究的起点——也就是以前人已达到的终点即前人最杰出的成果作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接力跑的起点，便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如他自己所说，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同时，我们认为，他又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最光辉的代表，新文化的坚实的奠基人，以他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sup>②</sup>结束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时代——虽然以后还不断有反复，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反复。因此我们由自然而自觉地选择了鲁迅作为导师和前进的出发点，先看看他对上述问题已解决到什么程度，再继续推进。

<sup>①</sup> 《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sup>②</sup> 原来意义上的客观的辩证的分析批判，而不是后来被“左”化了了的形而上学的“大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他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建树，而且只有建树新的，对旧的扬弃或否定才能成为可能，才是真正辩证的批判和否定。

## 二、传统和改革·保守性和坚韧性

与鲁迅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G. Le Bon)(1841~1931)在《民族进化的心理》中指出:一个民族不只是以某一时期的活人构成的,它也是由长期世代连续不断的死者,即其祖先构成的。所以,要了解一个民族必须同时了解其过去与将来,而积累的死者比之生者要多得多,也比生者的影响更强有力。他们深广的影响,无形的作用启迪着后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才形成了人们的观念和情感,造成了人们行为的动机。前人不仅给后人以生理的遗传,也将其思想赋予后人,所以死人是活人唯一无可辩驳的主宰,后人既要负担前人遗下的过失的重担,又受惠于他们的德行。<sup>①</sup>

鲁迅1918年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杂感中,从探讨中国民族性出发,称引了勒朋的上述观点,并指出:“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三十八》)<sup>②</sup>

由于前述中国的地理环境的条件和历史的连续性,中国的人口和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使中国的民族精神——“无论好坏”,就更其“不容易”改变了。

这个不容易改变的稳定的特性无论就其自身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又都具有二重性。我们把它分解为坚韧性和保守性,分别加以探讨。

### (一) 中华民族精神的坚韧性

坚韧性,这是由中国的环境、连续的悠长的历史和稳定的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对内对外的抗争中造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

鲁迅毕其一生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特别是对中、日“国民性”的比较,在他去逝那年——1936年3月4日致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的汉译者尤炳圻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精辟的结语: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书信·附录·致尤炳圻》)

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在东亚大陆的河川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正是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求安稳的心理。而它的北面、西面正是横跨东北亚、北亚、中亚、西亚直到东欧的世界最广阔的狩猎——游牧地带,正是具有“相对隔绝机制”的中国地理环境中敞开的大缺口。而游牧民族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的特征恰恰在于游动性,在那文明低下的时代,掠夺更成为强悍的游牧民族获取财物——尤其是自己不能生产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最简捷的方式。丰饶的中国农业区域自然成了游牧民族

<sup>①</sup> 参见张公表译《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商务印书馆,1935年4月初版。

<sup>②</sup> 后来鲁迅又指出:“幸而谁也不敢十分说定: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并特别强调:“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觊觎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内部一分离、软弱、崩溃，就必然会遭到时刻伺机南下和东进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华民族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和掠夺，需要并实际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防御工程。始终存在的强大外部威胁成了促使人民、国家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外部因素。正是守土保国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烈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传统，而且使忠君与爱国常常能保持一致。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是早已悟出并善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统治者贯于把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情绪引向国外，以巩固、强化自己的统治。古有名训：“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

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治下的臣民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坚韧地支撑着，而“外患”——民族的敌人，往往是共同的。<sup>①</sup>而“内忧”则不尽相同，实际上正相反——统治者忧的是被统治者造反，而被统治者忧的是统治者的暴虐、沉重的压迫和剥削。这种矛盾运动，就体现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治”与“乱”的交替。

为了抵御外患，中国至少自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即已开始了长城的修建。以后世代不断地修筑，逐步连接、加固，至今未已——只是当今修复长城已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是作为文物古迹加以维修罢了。这13,000余里的坚实厚重的长城，它不仅是古代世界最大的防御工程，就是现在也是无与伦比的，它是“相对隔绝”的自然缺环的人工补充。

而与横卧于重峦叠嶂、边塞之上东西向的巨龙般的长城相映照，纵贯南北平原之上与长城齐名的大运河则是适应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需要的产物。运河的开凿也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吴国的邗沟，以后历代不断开挖、延伸、沟通、疏浚，终于形成了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全长3,000余里的南北运河，这也是古代世界所仅见的最长的运河。它所连接的是京畿与经济繁荣的主要农业区域。它同长城一样，是庞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调动和组织农业经济提供的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但它与纯军事功用的长城不同，除了为国家输送兵员和给养外，也是国家输送其他物资的最主要的渠道，同时为农业和百姓提供了灌溉、排涝和物资、人员交通之利，具有内部的统一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多种功能

长城的修建和运河的开凿，一为御外，一为连内，都几乎是与中国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形成、统一、巩固、盛衰同步的。巍巍长城由炎黄子孙的骨肉砌成，静静运河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汗。这一刚、一柔，正是我们民族坚韧、沉静的性格的体现和象征——正象以孔子和老子为祖师的互补的儒道两家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代表和集中体现一样。

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是最庞大的，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而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形成的基础和功能首先是在内而不在外。它是建立在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而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愈强盛就愈要限制和削弱地方豪强势力、最大限度地限制土地的集中。自氏族部落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的细胞便逐步被分散到了刚能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最小单位——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小生产和生活单位。异常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恰恰建立在最细小分散的小生

<sup>①</sup> 当然，当这“外”入主中原或“归顺”之后，经过酸甜苦辣的交融、同化，又会转化为“内”；然后，又一同对付那尚未同化的新来的“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结构也就不断增添新的成分，不断扩大。尚血统的中华民族恰又是历史上不同民族混血交融甚为深广的民族。

产的基础上。中国的宫殿城池的坚实庞大是封建时代的欧洲国家所不可比的，中国小农经济的分散、狭窄、脆弱，农舍简陋的程度，也是欧洲庄园所不可比的，而中国皇家和官府与平民百姓居住、生活等方面的悬殊对比更是西欧封建社会所不及的，这是西方人到中国考察后和中国人到西方考察后的共同的强烈印象。<sup>①</sup>这样极端的两极对立也是世所仅见的。

这种由数量极大而单位极小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和社会细胞构成的基础与庞大的中央集权的上层建筑的两极的统一，就使得这种统治异常稳固。而且即使下层人民到了万难忍受的地步，积数量巨大的小民百姓形成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浩大的农民起义，甚至“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也仍然翻不出新花样来——不能代表自身利益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和农民小生产者依然要拥立一个新的主宰，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sup>②</sup>也就是立个“好皇帝”，还得回到封建宗法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封建宗法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不仅具有金字塔式的稳固性，而且具有不倒翁式的回复能力，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近乎循环的停滞状态，缓慢的生活节奏，真使人感到“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华盖集·忽然想到》）

我们比较一下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对称的位于亚欧大陆西部的欧洲，尤其西欧，就从来没有在那么广的地域形成比较单纯的农业经济。中世纪的欧洲庄园经济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实力也比中国的一夫一妻的小农户强大得多。这种相对强大的庄园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力量，使欧洲，尤其西欧，从来没有形成过中国式的大一统的局面，甚至一国范围内，也没有象中国封建专制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控制得那么周密严实。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东亚这块土地上，这样世世代代，一滴汗、一滴血地淌过去，垒起了万里长城，开凿了千里运河，抗拒了一次又一次外来的侵略，并以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并在这些斗争中磨炼出了我们民族的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鲁迅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在我们民族丰富的文化中，广为流传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故事和成语。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使中华民族经受住了几千年的内忧外患，直到近代，这种力量在反帝爱国斗争中仍显示着它的生命力，使中国抗拒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的瓜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持久战的思想实践的胜利，无不体现出了中国的国情的特色和中国的这种传统精神的力量。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道：

我目睹了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白的现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

① 康有为在《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游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中写道：“王宫三层，黄色艳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劫富豪，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四）西方人叹中国宫殿之宏大记载更多。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法国的小农的状况和对专制的经济根源的分析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小农和小农经济的政治基础是一致的。不过中国的小农的个体经济比法国的小农经济更弱小而数量要庞大得多，因而中国的皇上的权威也就更大得多。

的明证了。（《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的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在那样漫长的岁月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抵御过来自不同方面的那样强大的侵略，而终于仍保持了自己的辽阔的幅员，繁衍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屹立于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那么长的时期受过那样强大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压抑和精密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仍保持着自己的斗争的“勇毅”——而在由血缘父系家长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延伸发展而来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妇女又被压在最底层，因此，在她们身上积聚的这种沉勇的精神就更加坚毅。

## （二）中国民族精神僵化的保守性

与这种韧性的战斗精神相关联、相对应，在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也形成了“不易改变”的传统精神的另一面，即二重性的另一重性格——因循守旧。它不是面向未来、继往开来，而是维持“从来如此”的“祖宗的成法”，维持旧的社会状态和思想文化的保守性，是民族精神老化的积淀。

正因为我们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过相对辉煌过去，这过去既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自信的鼓舞力量，是我们进向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与现代社会差距太远，如蛰居在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偏僻山区、莽原深处、荒漠沼泽和汪洋孤岛上的一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群体，现在仍处于原始公社的中期和后期，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蒙昧时代，与现代文明隔着一个或多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梯，很难衔接上，在发展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多困难。

但是伟大的旧的文明同时又是我们进向新文明的重负。首先，我们在事实上已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要赶超这些先进国家，就得先承认现实的落后。这对一个有着伟大的过去的民族来说是格外难的，要经过许多反复的事实的教训的比较和痛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认识，才能卸掉这个包袱。

“五四”前夕，鲁迅分析当时人们尚古的心理对改革的抵触时写道：“古人所作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鲁迅把这种消极保守甚至“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的昏乱的“爱国论”归纳为五种，其中的前四种最普遍，影响也最持久，甚至今天还音犹在耳。其前四种为：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高。”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热风·三十八》）

鲁迅塑造的以“先前阔”，甚至以别人“还不配”的癞疮疤骄人的阿Q和阿Q精神就是其具象化的代表。

由于沉醉于古往，就容易麻痹了对现实和未来的追求。青年鲁迅对芬兰、波兰、匈牙利、菲律宾、印度、越南等东欧和南亚曾经沦亡过的国家的作者所写的“被异族虐待的文章”的研究，将这几国人的“真挚壮烈悲凉”的声音作了这样的区别：

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兴，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

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如何不行仁政。譬如两个病人，一个是希望那将来的健康，一个是梦想着以前的耽乐，而这些耽乐又大抵便是他致病的原因。

即同是爱者，一是面向未来，一是梦回过去，而其梦想的过去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导致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腐败、沦落、亡国的根源。所以鲁迅又说：

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是属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痛苦，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

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近代史，尤其思想文化史论争的主线就是古今中西之争，论争的实质，就是中国到底是恢复固有的文明，重振明朝的“汉官威仪”，进而回到汉唐盛世，甚至唐尧虞舜之时，还是承认现世的落后，面向未来，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开辟崭新的时代——直到今天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感觉到这两种思绪的承转。我们今天能取得和确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总体认识和大政方针，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实践和论争不断深化而达到的意义十分重大的成果。

六十多年前，鲁迅在将中日两国的历史文明进行比较之后曾辩证地指出：日本古代的确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但是他们在学习中已经著了相当的成绩，“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命运总还是日本的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者，发达者更光彩。”（《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积亲历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经验，鲁迅痛切地说：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大会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的旧的腐败的思想文化，不仅有国内的社会基础、传统势力做后盾，而且，一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也逐步懂得了中国旧文化的妙用。鲁迅以他当时所见的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接过中国的“侍奉主子的文化”来奴役中国人民，配合其侵略的行径：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还请腐儒，教学生读《四书》；民国已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偏聘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最反对五四以来的改革；英督“金制军”也学佯“整理国故”于香港；日本人则拜骈文于北京，而且终于打出了“王道乐土”的旗号向中国进攻。鲁迅揭露说：

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人在尊重中国的文化了，那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这就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相勾结共同

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相应地在文化上结成的反动同盟的体现。

鲁迅怀着最痛楚的爱国感情指出：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守守旧的格言，但同时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外国人初来乍到，被称为蛮夷。但是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要赞颂这中国固有的文明、侍奉主子的文化了。所以，他又说：

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坟·灯下漫笔》）

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文化联盟，一方面是外来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对中国旧文化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封建势力对真正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的抗拒。

而对新文化的抗拒力由于有传统势力的靠山，由于长期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的存在，封建宗法的专制的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教化造成的民众的“**厚重的麻木**”（《三闲集·太平歌诀》），更构成了改革的**最大难题**：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正因为广大民众的“**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而且改变广大民众自身的状况正是社会改革的最根本所在。因此有志于改革者必须深知民众的心，首先着眼于广大民众，做**艰难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工作**。鲁迅十分称道列宁在这方面的见解：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改革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鉴于风俗和习惯即传统文化的世俗的积习的力量，鲁迅认为：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

鲁迅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一再揭示了民众对于改革和改革者的冷漠和麻木，提醒革命者首先要有正视这种“**黑暗**”的勇气。因此，他十分重视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认为这是**最要紧、最切实也是最艰难的工作**，并特别强调了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的民众文化心理的体现的习惯和风俗与改革的关系，指出：

……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我们文化改革的工作对象首先是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民大众。由于“**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之故，所以改革的入手，首先必须克服“**古训所筑成的高墙**”（《集外集·〈阿Q正传〉序文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指出：**

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遇。

（《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这就要“**采用新说**”，中国近代自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各个阶段、各种形式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变革就是破旧立

新的过程。而取代旧物的主要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生于工商业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

新制度、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传进中国，受到旧文化的硬软不同方式的最顽强抵抗。这种文化冲突至今未已。这是旧文化的生命力顽强的体现，也是其保守性的体现。

鲁迅指出，在中国人的思想和外国人的思想之间，“隔着几重铁壁”（《热风·五十九“圣武”》），那其中一道最古老的铁壁便是作为氏族遗风承续下来的儒家所十分强调的“夷夏之辨”——

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我们看看鲁迅笔下的近代从西方引进叫得最响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的命运吧。

先看科学。鲁迅说，叫了几十年的“科学救国”，中国的一些学者不但不是以新科学来补中国的固有文化之不足，却反而用以“证明”中国旧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甚至“灵乩”，也是合于“科学”的。

至于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则不但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舆论一律赞成”的“民意”；有“使人们变成沉默”的“共和”；甚至我们还看到了鲁迅所未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剥夺亿万人民起码的言论自由乃至人身自由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所以，鲁迅慨叹道：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

当然，这决不是这些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自身的弊病，不是它们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所引起的。如我们耳熟的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之类——如果有什么“危机”的话，也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创立的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恰在于我们的一些“化”家及其荐品的危机。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在科学与民主旗帜高扬、马克思主义刚刚转入中国的“五四”高潮期，鲁迅就指出了：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书信·200504致宋崇义》）

三十年代，鲁迅还批评了一些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批评家自命的人，却连人家的姓氏籍贯之类上代传下来的不自主的东西也拿来作攻击的材料。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动不动便祖宗三代的战法，“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过，这些已“十分封建”的人物的言行，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的封建血统论和封建法西斯的全武行来，却又逊色多了！可见，自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以后演变为以家庭农业小生产为基础、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血统观念的承续力量和社会功能是多么顽强。我们要创造真正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的“万年有长”的传统力量特点；要认真总结一百多年来，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文化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对抗外来新的思想文化方面，除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外，曾经为保持家族、国家、民族的人际关系和纵横各个系统的整合、稳定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儒家中庸思想——它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成为全民族性的“中庸心理”，也是重要的思想因素。

对这种中庸思想和心理对革新的消极抵抗作用，鲁迅也作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指出：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这种调和、折中，当然不是骑墙于新旧之间，不偏不依，骨子里还是要保护旧物，对改革是一种软抵抗的方法。鲁迅揭露说：

……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但是这种抵抗同时也在退却，而退却中又时刻准备着复旧。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老手段，只不过在改革的强劲有力的进逼面前，已显出了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颓败的晚景——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350410致曹聚仁》）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上述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格的韧性和保守性正是同一事物的二重性的体现。中国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和中国其所以还处于这样的状况，皆为这种二重作用的结果。但既是二重作用、二重性，二者就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性质，是由其具体内容规定的：坚持维护的是落后的旧事物，便起到守旧的作用，体现为保守性；坚持的是进步的事业，发挥出成就新事物的功能，便体现为创业的坚毅的韧性精神。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还要向未来发展下去，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无法割断历史；同时，也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历史的中国，而且今天的中国恰正处在一个由几乎是停滞了数千年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整个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被称作“第二次革命”的改革，虽然没有中国近代以前的多次革命所具有的武装斗争的特点，没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次“和平革命”是直接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而且已经引起了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革，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状况。因此，它是比前次革命更深刻、更根本的变革。

近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的思想文化是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在中国已经历了维新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多次与旧文化的冲突的浪潮。今天，随着“第二次革命”以来的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文化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正在迅速拓展和加强。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动力。

为了更新中国的文化，为了发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新文化，使中国的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走向现代化，进向崭新的文明，我们需要大胆地、无畏地尽量吸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尤其西方的先进文化，同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实现重新构建我们的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

1930年鲁迅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精辟地阐明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他指出：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转，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保守性及其对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有最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持久的深刻的彻底的批判；而他在对旧社会、旧势力、旧文化的斗争和批判中所坚持力行和提倡的“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恰又正是我们固有的传统的优良的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容与传统的韧性战斗精神的统一，正是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的特色。我们今天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而提倡发扬“愚公精神”，也正是这种传统精神与新的时代内容的结合的体现。我们通过反省，认清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作为这种民族文化的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二重性，正是为了从中找到能容纳新潮、融合新机的因素，克服沉重的传统精神的负累，以重新构建适应现代文明的新文化。

1986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颀

## 征 文 启 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学会函授大学、《社会学研究》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商定，于1987年5月在贵阳市联合发起召开以“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学”为中心议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资格通过征文确定。应征者可在中心议题范围内，就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问题、现代化的模式问题、改革与人的现代化问题以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等专题撰写论文。应征论文请于1987年3月底以前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综合室。论文中选者将被邀请与会。未中选论文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1986年12月